

● 历史学

略谈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

张 德 明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49-), 男, 湖北京山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

[摘 要] 战前美日殖民角逐是60—80年代中期亚太经济中美日竞争的历史根源, 战后美日和亚太经济迅速发展的某些结果是其现实原因; 该时期是两国激烈竞争的典型期, 日本在贸易、投资和经援三方面赶超美国而占先; 经济实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经营策略是决定竞争结局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亚太经济; 美日竞争; 缘由; 情景;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 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845-06

对美日双边经济关系学术界给予了充分关注, 而对亚太(亚洲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中的美日竞争却研究不够。本文试对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作初步探讨。

一、竞争的缘由

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重要的现实原因。明治维新前后, 美日以太平洋国家的身份进入亚太经济。日俄战争后, 美日殖民角逐的序幕逐渐拉开, 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 两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争斗的实质是: “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对“武力扩张, 市场独占”。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来排斥美国, 独占亚太的市场、原料和投资场所。它一度得手, 用刺刀控制亚太经济4年。战后, 美国乘日本退出和西欧国家无力恢复昔日影响之机成为亚太经济的主宰。通过缔结“城下之盟”, 日本成了美国的小伙伴和亚太利益的看守者。日本对此不甘心。它互为条件和结果的两个目的是: 恢复和增强日本的国力; 夺取亚太经济的主宰权。由于战败力量衰弱和被剥夺了拥有武装的权利, 日本只好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与和平的手段。首相吉田茂说: 日本的天命“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本国的安全和发展由于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结成亲密的同盟而得到最可靠的保证……正如美国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现在比英国强大一样, 如果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它最终将变得比美国更强大”^[1](P. 9—10)。为此, 日本决心利用美苏冷战将军事上的失败转化为经济上的胜利^[2](P. 150)。果然, 经过20年的卧薪尝胆, 日本开始追求亚太经济

中的优势地位。1966年外相三木武夫提倡“亚洲——太平洋圈”的构想: 美、加、澳、新和日本太平洋五国合作, 共同援助亚洲的开发; 日本则是太平洋各国与亚洲各国相联结的“桥梁”^[3](第143页)。亚洲国家认为这“是企图通过通商、友好和经济合作重现改变了形式的大东亚共荣圈”^[3](第158页)。1969年亚洲太平洋地区理事会会议上, 一位有影响的日本阁员说: “大共荣圈? 这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过去是想用武力来建立, 但今天却是用经济力量来建立”^[4](第197页)。其意是日本要用和平的方式完成昔日未能用武力完成的“事业”。日本取代美国主宰亚太经济的意图显而易见。美国人当然意识到这一点, 一美国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 “当我们看到日本目前对南朝鲜和东南亚实行侵略性的经济政策, 而一位有影响的日本阁员又使我们想起‘大共荣圈’时, 我们不禁对日本现领导人重新开展‘大共荣圈’运动感到担心”^[4](第198页)。美国会拱手将亚太经济的主宰权让给日本吗? 尼克松在就职总统的前二年即1967年就声明: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强国, 欧洲已经和正在撤走其帝国的残存部分, 但是拥有一条从墨西哥到白令海峡弧形海岸线的美国是广阔的太平洋世界的一根支柱。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鞭策我们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伙伴而西越太平洋”^[5](P. 104)。尼克松的弦外之音很清楚: 当欧洲在亚太的殖民残余消逝后,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允许日本独霸亚太经济。事实证明: 战后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渊源于战前的殖民角逐, 尽管前者与后者有着质的区别。

战后美日和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导致两国激烈竞争

的现实原因。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 2/3 和世界制造业的一半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在美国源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 50 年代开始,除汽车、钢铁和化学产品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外,电脑技术、信息系统和第三产业三大门类的产品威风凛凛地登上市场^[6](第 358 页)。由于二战的刺激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从 1940 年至 1973 年美国取得高速度的增长^[6](第 318 页)。日本经济的发展更是世界资本主义史上的奇迹。1955—1970 年其出口年增长率为 14%,进口年增长率为 16%,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近 11%^[7](P. ix),197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8](P. 23)。70 年代日本把使自己经济受挫的石油危机变成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契机,在实现重工业化后又走上了低能耗、高科技产业发展之途。它将美国首创的高科技为己所用,在电子消费品生产方面建立了优势。又成功地研制和成批生产高效节能的小型汽车。由于对科技的高度重视,到 80 年代初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领先欧洲,接近美国。因此,无论是其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还是技术密集型产品都具有强大竞争力,风靡全球。产品源源流出,财富滚滚而来,到 1986 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金供应国。美日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若干相同的后果:洪流般的产品、巨额的财富、对原料的需求和产业的外移。从而最终导致对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争夺。这里对原料产地的问题略加说明。原料产地对日本至关重要,因为资源贫乏是日本“阿基里斯的脚踵”(Achilles' heel)。若无源源不断的原料流入,日本的奇迹就会终结。美国虽然资源富有,但有些工业原料如天然橡胶、锡、纤维等和有些农产品如热带植物油、茶、香料等也需进口。美国尽管也是石油生产国,但以美国石油公司为首的全球七大石油公司为控制国际石油市场,需要占有海外石油资源。美日所青睐的重要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之一就是亚太。

亚太自身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机遇也增强了对美日的吸引力。步日本之后,新奇迹接连而来。先是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上半期“四小龙”的腾飞,到 80 年代中期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接着是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东盟四国的崭露头角,不久成为准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后是 70 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的改革开放,到 80 年代中期已取得显著成就。亚太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之一是投资场所的扩大。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资本。上述国家和地区原来底子差、资金严重不足,必须利用外资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此,都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加上过剩廉价的劳力,使亚太成为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之二是工业原料的开发。东盟四国和中国大陆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原料:石油、天然气、煤、锡、镍、铝矾土和天然橡胶等藏量巨大。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比较优势的发挥,自然资源会越来越多的得到开发和利用,成为先进工业国理想的原料产地。之三是商品市场的扩大。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发展中国和地区的财富剧增,80 年代中期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都相当于 60 年代中期的好几倍。财富的增多和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消费。1965—1985 年“四小龙”、东盟四国和中国大陆的进口年均增长率,最低者为 10.9%,高者达 26.9%。^①1981 年它们的进口已占世界进口总值的 32.6%。^②另外,亚太沿岸海道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运输线。其中的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例如日平均 20 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供应日本所需能源的 75%^[9](P. 188)。亚太海域的战略价值是吸引美日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竞争的情景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是美日竞争的典型期。基本特征是美日较量激烈,后者赶超前者。时段界定的理由:1、1965 年是日本经济竞争力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之前其国际收支年年逆差,之后经过几年的大致持平后呈现顺差趋势。也从同一年起,在美日双边贸易中日本保持顺差趋势,此前几乎年年逆差^[5](P. 148,169)。2、1966 年日本对美国在亚太经济中的领导权提出挑战:主持首次东南亚经济开发部长会议;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创始者之一;建立东南亚农业基金^[10](P. 42.)。3、经 20 年的激烈博弈,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日本的地位和影响于 1985—1986 年最终超过美国。此后竞争仍在继续,但具有不同的特点。商品贸易、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含官方援助和民间贷款)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三个基本方面。美日竞争即表现于此。

商品贸易:60 年代上半期,就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而言,在韩国、南越、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美国领先;在泰国和柬埔寨,日本领先;在台湾和香港,美日相当。从 60 年代中期起,两国抢占市场日趋激烈。日货进入几乎由美国独占的韩国市场,在美传统市场菲律宾排挤美货,在台湾、香港、印尼、泰国、新加坡市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一则力保在各市场原有份额,二则乘美中关系改善之机重新进入潜力最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到 70 年代在东盟市场,日本已占最大份额,但美国的占有率也在不断上升。到 80 年代中期,除了对菲律宾的进口占有率美国大于日本外,对其余 4 国的进口占有率日本都大于美国。在东盟的出口中,到 80 年代中期,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最大出口市场是日本^[9](P. 122);同期,对韩国的进口占有率,日本第一美国第二,对其出口占有率则正好相反。在台湾,日本为其最大的进口来源,美国为之最大的出口市场。1969—1982 年日本对香港的进口占有率最大,美国则对其出口占有率最大。到 80 年代中期,在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占有上日本胜过美国许多,在吸收其产品方面美国也不如日本。竞争的结果是,在贸易收支上有利于日本。到 80 年代中期,在对东盟(作为整体)、韩国、台湾、香港的贸易中,日本全为顺差,美国均为逆顺。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美日皆为顺差。一般而言,在美国—日本—亚太三角贸易中,1945—1965 年美国对日本保持顺差,日本对亚太保持顺差,美国部分地通过日本占领亚太市场。1965—1985 年日本对亚太保持顺差,亚太对美国保持顺差,日本部分地通过亚太占领美国市场。同时,美日对亚太的原料、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原

油的争购也非常激烈,结果,日本胜美国。

直接投资:60年代上半期,美国在韩国、台湾、香港和南越居绝对优势,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也领先日本,只在泰国日本领先美国。在东盟从60年代中期起,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快,1966—1977年年增长率为13.7%,而对世界的为9.9%^[11](P.62)。约同一时期(1966—1976年)日本的投资从不到美国的1/4增至比它多1/3^[11](P.6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国的投资从占对世界投资的比重2%升到4.5%^[12](P.105)。日本的增长更快,到80年代中期比美国的投资还多1/3以上^[11](P.63)。若将1986年的投资与1966年的相比,日本增加了83.3倍,美国只增加了12.4倍。^⑤两国投资在制造业和石油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在韩国,日本的投资逐步压倒美国。1962—1966年美国占韩国外来投资的52.7%,日本占17.5%,1972—1976年美国占15.4%,日本占71.3%,1982—1985年美国占32.3%,日本占52.2%^[13](P.151)。美资主要在石油精炼、石化产品、运输设备等方面,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电子电气产品方面也有少许。日资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占绝对优势,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也有少量。在台湾,美国1966—1980年的投资为6.9774亿美元,年增长率为8.79%,1980—1987年的为14.9253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0.83%。日本1966—1980年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8.17%,1980—1987年的为13.256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4.51%^[14](P.105)。论投资增速日本比美国快,论投资累计额美国比日本多。美资主要在电气电子、无线电、电话电报、仪器、化学和汽车等领域。日资主要在纺织、电子电气、机械和汽车等行业。在香港,美日投资占外资的比重1975年分别为49.2%和15.5%,1981年为43.6%和31.5%,1986年为41.2%和20.5%^[15](P.135)。美国作为香港的最大外来投资者而胜过日本。美资主要在贸易、制造业、财政保险等领域。日资主要在贸易、成衣、电子电气、钟表和金融等行业。在中国大陆,到1986年为止,美资累计为12.48亿美元,日资为11.5亿美元^[16](P.213)。制造业是两者竞争最激烈的行业,美资的77%和日资的53.1%在此行业^[17](P.128),尤其集中于电子电气产品和小型用具的生产。其次是服务行业,该行业吸收美资的11%和日资的25.2%^[16](P.128—129)。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是两国资本争相投放的地区。美日投资真可谓你追我赶,互不相让。论投资增速,日本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比美国快。讲投资累计额,在东盟和韩国,日本占压倒性优势,在香港,美国则远胜日本。在台湾,美资比日资多一些,在中国大陆,美资比日资多一点。

经济援助:6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在韩国、台湾、南越、老挝、柬埔寨、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均占绝对优势。即使将战争赔偿也算作经济援助,也只在印尼,日本领先美国。60年代中期后的若干年里,在许多国家美国仍居优势。1970年美日对东盟五国的双边援助之和分别为2.56亿和1.729亿美元,分别占西方国家双边援助的40%和27%。除了对新加坡的援助日本领先美国外,对其余四国的援助,美国都比日本多。到1984年,美日援助各为2.87亿和10.39亿美元,所

占相应比重为15%和54%。日本对五国的援助均超过美国。^⑥在越南,美日援助竞争是替代性的纵向竞争而非同一时期的横向竞争。1975年前,南越战时经济被称为“援助经济”。1965—1972年南越政权开支的49%来自于美国经援^[18](P.56)。1966—1975年对南越的经援美国为61.227亿美元,^⑦日本仅为0.72亿美元(1960—1975年)。^⑧1975年后,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彻底退出南越经济,由日本填补“真空”。1978、1979两年,日本就为越南提供贷款和赠款280亿日元^[1](P.128—129)。进入80年代后,日本扩大了对越经援,成为越最主要的外援国。在韩国的外援中,日本逐步取代了美国的地位。1965年前,美国提供韩国外来经援的95%。之后情况渐渐变化。1965—1983年日本提供的经援达55.55亿美元^[19](P.185)。而1966—1974年美国提供的为5.55亿美元^[4](第303页),(1974年美对韩官方援助结束)。日本的经援大大超过美国。70年代初,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主要的资助者。在台湾,美国的官方援助1965年结束,但美资以贷款的方式继续流入。1965—1980年达53.8亿美元。^⑨60年代下半期,日本向台提供贷款2.1亿美元。^⑩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对台的官方贷款停止。在台湾,美国的经援压倒日本。在中国大陆,情况正好与在台湾相反,日本的经援大大超过美国。80年代上半期,在接受日本官方开发援助最多的十名对象中,中国大陆连续几年名列第一、二名,^⑪而中国大陆并不在美国官方开发援助的受援国之列。1984—1986年日对华贷款为47.57亿美元,美贷款仅为1.08亿美元。^⑫综上所述,在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援中,除在台湾美国超过日本外,在其余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都以绝对优势胜过美国。

美日在多边经援中也逐角甚剧,突出地表现在亚洲开发银行内。日本在缴付股本、占据最高职位和制定政策等方面都力图压倒美国。与美国的拖欠作风相反,日本积极主动缴纳承诺的金额。到1979年,日本占普通基金的17.5%、亚洲开发基金的50.3%,而美国的则为11.9%和15.2%^[20](P.67)。到1987年日美占总股本的份额分别为45.8%和13%^[21](P.1478—1479)。亚行行长一直是日本人的“专利”。在亚行的前10年中,有5位行政部(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部长也是日本人。在政策的制定上,日本人的作用颇大。农业特别基金就是根据其提议设立的,出发点就是为日本的利益服务的。日本主张政经分离的政策,以对抗美国反对援助越南的企图和抵制美国将人权问题作为提供贷款的政治标准。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国内反对外援的情绪强烈,在国会的钳制下,一再拖欠承诺的金额,不得不将亚行领导权让给日本。为取得与日本同等的投票权,它也尽力追缴欠款。1978年其投票权只占总投资权的9%,少日本7个百分点^[20](P.132)。到1987年它所缴的普通基金与日本大致相等,故投票权也基本一样^[21](P.1478—1479)。日本以积极缴付款项的方式争取在政策制定上更大的发言权,美国则以故意拖欠股金的办法迫使亚行按自己的意愿办事。

三、竞争的启示

美日20年的竞争及其结果给我们以何启示?

(一)经济实力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前提,是竞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曾被历史证明。战前,美国是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日本是地区级工业强国。两者经济实力相差一个档次。正因为如此,在亚太殖民角逐中,美国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坚持“武力扩张、市场独占”。后者的实质是在对亚太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的竞争中以武力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日本之所以始终不肯接受“门户开放”的原则是因为明知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在此原则下竞争,失败者只能是自己。战后的事实说明了同一道理。战争使昔日的繁荣化为乌有,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不具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前提,只能当美国亚太经济扩张中的小配角。经过 20 年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初步获得参与竞争所需要的经济实力。因此,在 60 年代中期向美国的主宰地位提出挑战。直至 8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愈益发展,实力更为增强,为在亚太经济竞争中最终夺取优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二战的结果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用,美国举世无双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到 60 年代末。60 年代中期前,它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亚太经济中的主宰地位不可动摇。但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其它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70 年代初期后其经济实力渐渐削弱,1980 年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45 年的 50% 降至 25%^[22](P. 91),1985 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沦为纯债务国。与此相一致,进入 70 年代后美国在亚太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发生动摇,市场份额渐渐被日本挤占。尽管它也奋力抗争,力保原有份额,但仍无济于事。到 80 年代中期,美国在亚太(除了一两个国家和地区外)在贸易、投资和经援方面的优势全部丢失给日本。

(二)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合作是商业竞争力的源泉。日本所显示的强大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政府和企业的亲密关系。在日本的经济建设与对外经济活动中,政府和企业总是“结伴而行”即二者密切配合、情同手足。被这种特殊关系联在一起的政府和企业被形象的喻为“日本股份有限公司”(“Japan Incorporated”)。这种关系的形成并非日本政府像其它国政府那样对大企业有很大的直接所有权所致。相反,这种所有权在日本十分有限。“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质是通过“以政府若干个部(省)和像日本银行这样的组织为一方与以工业组织同贸易组织相融合而形成的正式的企业集团为另一方的双方相互影响的一种复杂的机制,官方与企业领导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作用而又形如一体的模式”。前首相池田勇人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阐述得更清楚:“……政府是船长,财界是指南针”^[7](P. 42)。说到底,在日本有组织的企业与政党领袖和官僚顶层之间保持着一种明显的亲密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由明治年间出生的老一代传给大正年间出生的第二代,又传给昭和年间出生的第三代。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一代又一代管理和技术人才为一个共同的民族经济目标而团结奋斗。可见,“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本民族合力的体现。“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南亚、整个亚太乃至全世界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美欧商人闻风丧胆,以致“70 和 80 年代美国人和欧洲人

严厉谴责‘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是政府与企业的一种邪恶的同盟。受日本‘不公平竞争’伤害的企业和工人呼吁其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措施”^[23](P. 1170)。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在经济竞争中的威力与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美国的官僚机构总的来讲也是积极支持美国的公司在海外的商业竞争的。但政府与企业有时发生对抗^[11](P. 79)。且美国的一些法律如《反托拉斯法》、《海外美国人征税法》以及《人权修正案》等都多少妨碍了美国的公司在海外的商业活动,束缚了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与自己的对手日本比,美国官方与企业的合作程度相形见绌。

(三)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高科技产品的作用是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效解数。^⑥70 年代美日抢占东盟市场的情形对此是最好的注脚。两国向东盟出口的产品可分为四大类: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人力资本(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美国第一大优势在于技术领先,故其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它向东盟出口的四类产品的比重最大,上升的幅度也最大,从 1970 年的 46.3% 升至 1979 年 71.2%。而它对世界出口的同类产品占它对世界出口的四类产品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化,从 45.1% 升至 45.5%,这说明美国为与日本争夺东盟市场,充分发挥它的第一比较优势,将东盟作为投放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重要市场。自然资源是第二大优势,因此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曾占到 1/3 的比重,但下降幅度很大。熟练劳动已算不上优势,故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占的比重小。非熟练劳动已成为劣势,因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的比重最小。就日本而言,熟练劳力是一大优势,故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占的比重最高:1970 年为 39.7%,1977 年为 44.6%,但比它向世界出口的同类产品的相应比重略低。技术是另一优势(尽管比美国的水平低一些),故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第二:1970 年为 34.3%,1977 年为 37.3%,但大于它对世界出口同类产品所占的相应比重:25.4% 和 29.1%。日本和美国一样,也将东盟作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重点投放市场。非熟练劳动已不是优势,因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不大且不断下降。自然资源是劣势,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微不足道。这些清楚地说明美日是如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争占东盟市场的。在所发挥的优势中,技术密集型产品是优中之优。下述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此点。70 年代在东盟的进口贸易中,在日本占最大份额的情况下,总的看来对东盟的出口美国比日本还要好一些。1971—1977 年美国对东盟的出口比预计的高出 9.6%,而日本只高出 6.8%^[11](P. 49),主要原因是美国加强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美国经济学家克劳斯指出:在东盟这个以日本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地区,美国能够成功地迎接日本的挑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东盟的高科技产品进口中占有较大比重。美国对印尼和菲律宾的出口不令人满意也正是由于 1973—1974 年后美国对这两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缘故^[11](P. 49)。

(四)经营策略是超越对手的法宝。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日本人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灵活机动的经营策略。仅述其中两项:一)推行“一揽子交易”。即日本的公司通过与亚太国

家或地区的一项业务联系而使自己成为具有多功能的商家。例如,日本的公司在东盟建立合资企业,通过与当地合营者的特殊关系,不仅供给他们机器设备、工业原材料,而且提供贷款甚至股本以及管理和技术知识等。这样一来使得对方在进出口贸易、投资、贷款、信息和技术诸方面都依赖日本。一揽子交易的另一表现是:日本贸易公司除了主要从事市场营销的“本职工作”外,还充当金融业者,外汇经纪人、组织者和顾问以及信息推销员^[13](P. 70)。总之,通过合资办企业或者市场营销一种途径,日本既加强了对亚太国家的商品出口、资本输出,又迫使它们在出口市场、管理技术、知识方面依靠自己。从而全面加强了这些国家与日本的经济交往,削弱了它们与日本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而这种一揽子交易对美国的公司来说则是陌生的。二)兴办合资企业。这是日本人在投资竞争中最先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源于60年代上半期的印尼。1957—1965年苏加诺政府将境内欧美企业全部接管。日本私人资本立即以新的方式乘机而入。1960—1961年日本的公司在印尼办了三个合资企业分别开发印尼的石油、镍和木材^[24](P. 89)。欧洲人也谨慎地仿效。于是合资企业在东盟逐渐发展起来。然而,“美国人由于害怕泄露机密和技能”而不愿意接受合资企业的形式,即使勉强接受,也要求占有多数股份以控制合资企业。日本人则不同,由于他们一则看到合资企业对日本投资有利,二则把它作为抢占市场的主要手段,故“日本投资者似乎远比美国和英国的投资者愿意接受合资企业。”而且“日本在东南亚参加的合营企业中,日本人占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少股份的企业达百分之六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人的态度有所缓和,因为害怕将东盟的市场丢失给日本人,但“对那些成本低和面向出口的企业的投资,许多美国公司的态度看来仍不那么灵活,仍然坚持拥有百分之百的企业所有权的政策^[25](P. 132—134)。由于日本人策略灵活,所争取到的投资机会和所投入的金额自然比美国人的多得多和大得多。

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区。美日竞争是影响亚太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更深入地开展对此问题的研究对参与21世纪亚太经济竞争的中国十分必要。

注 释

-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编数据计算得出,数据转引自郑励志:《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 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编数据计算得出,数据转引自Bela Balassa,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Pacific Area Developing Countries*, Houndmills,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p. 26.
- ③ 根据下面两书中的数据计算得出:Seiji Naya and others, *ASEAN—U. S. Initiative*,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p. 100; Lawrence B. Krause,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PP. 62, 60.

- ④ 根据 Inoguch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转引自《南洋问题译丛》,1994年第3期,第12页。
- ⑤ 根据下面书中的数据计算得出:Douglas C. Dacy, *Foreign Aid,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th Vietnam, 1955—197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9 Table A10. 1. and P. 200 Table 10. 2.
- ⑥ Douglas C. Dacy 前引书 P. 204.
- ⑦ 根据下面书中数据计算得出: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页。
- ⑧ 根据下面书中数据计算得出:叶学哲:《国际资金流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32、137页。
- ⑨ 马成三:《日本对外贸易概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表1—12,资源来源:日本外务省:《我国的政府开发援助》。
- ⑩ 马成三前引书,第274页表10—3,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 ⑪ 此点引用的所有数据(除另注外)见 Lawrence B. Krause 前引书 P. 43 Table 4—1 和 P. 46 Table 4—2.

[参 考 文 献]

- [1] NESTER William R. *Japan and the Third World* [M].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 [2] BORDEN William S. *The Pacific Alliance* [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 [3] [日]丸山静雄. *东南亚与日本*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南朝鲜经济* (译文集)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5] IRIYE Akira & COHEN I. Warren.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M].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 [6] [美]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 [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7] SANDHU Kernial Singh, TANG Eileen P T. *Japan as an Economic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M]. Singapore: Stamford College Press Pte Ltd, 1974.
- [8] MCCORD William. *The Dawn of the Pacific Century*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9] KENDAL Harry H, JOEWONO Clara. *Japan, AS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Berkele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1.
- [10] WONG Anny. *Japan'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ASEAN Countries* [M].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 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 [11] KRAUSE Lawrence B.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 [12] NAYA Seiji, etc. ASEAN-U. S. Initiative [M].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 [13] STEVEN Rob. Japan's New Imperialism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 [14] CHEN E K Y, etc. Taiwan [M].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 [15] HO Yin-Ping. Trad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 [16] HOLTON Richard H, WANG Xi. U. 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M].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 [17] KELLEY Lane, SHENKAR Od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China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18] BERESFORD Melani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M].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 [19] MACDONALD Donald Stone. The Koreans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 [20] BLAKER Michae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South-east Asia [M]. New York: The Trust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83.
- [21] TALOR Robert H. Asia and the Pacific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1.
- [22] SATO Ryuzo, WACHTEL Paul. Trade Fric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3] MCKAY John P, etc. A History of World Societies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 [24] TAN T K. Sukarno's Guided Indonesia [M]. Indonesia: The Jacaranda Press, 1967.
- [25] [澳] 托马斯·艾伦. 东南亚国家联盟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张琳)

U. S. -Japan Competition in Asian Pacific Regional Economy

ZHANG De-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De-ming (194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Rim.

Abstract: The U. S. -Japanese colonial contention before WWII i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U. S. -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economy of Asian Pacific Region from the mid-1960s to the mid-1980s, some result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Japanese and Asian economies after WWII are the current reasons; the period is the typical one of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Japan caught up with and surpassed the U. S. on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aid, and taking the lead; national economic power,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omparative advantage play and management tactics are main factors to decide the outcome of the competition.

Key words: the economy of Asian Pacific Region; the U. S. -Japanese competition; reasons; performances; enlightenment